



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34^{*}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1999 年 8 月 17 日 致秘书长的信

我谨荣幸地提及大会 1998 年 11 月 4 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特米先生阁下提案基础上,未经表决通过的关于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第 53/22 号决议。我特此报告,依照该决议第 3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协作,于 1999 年 5 月 6 日在联合国总部主办了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一种新的范式”的小组讨论会。

小组讨论会是在第 3 会议室举行的,会场出奇地拥挤。联合国各外交使团、秘书处成员、学术人员、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新闻媒体踊跃参加了讨论。

除了小组成员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塞内加尔常驻代表、印度常驻代表、奥地利常驻代表、吉尔吉斯斯坦副常驻代表、意大利副常驻代表以及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些人也作了发言。

人们从若干角度探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问题,包括宗教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联合国作用的全球方针以及特别强调个人的重要作用的微观层面方针等。人们在讨论中,看来比较普遍地同意,“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一倡议是及时的,它展示了一种适应我们时代要求的新的范式。人们对不同文明之间冲突论,也普遍持否定态度。

饶有兴趣的是,或许为了向世人警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持续重要性,都提到了十三世纪波斯大诗人萨迪的下述诗句:

“亚当的所有后裔都血肉相连

“因为他们最初都来自一个本原。

^{*} A/54/150。

“遇不幸一肢遭受损伤

“其它肢体也会失去惯常的安康。

“如果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

“就不配称为亚当的子孙。

鉴于小组讨论会上提到的观点和理念的重要性,同时鉴于它们引起了同样重要的意见交流,我谨再次荣幸地随函转交关于本次小组讨论会的行政摘要。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临时议程项目 34 项下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级临时代办

迈赫迪·达内什-亚兹迪(签名)

附件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一种新的范式

小组讨论会

联合国总部

1999年5月6日

- 主席:** 詹罗梅尼科·皮科先生,前助理秘书长
- 小组成员:** 瓦尔坦·格利戈林博士,纽约卡内基公司总裁
- 理查德·布利特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 阿里·梅兹罗伊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全球文化研究所所长
- 贾瓦德·扎里夫博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 欢迎辞:** 哈迪·内贾德-侯赛尼安大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 莉萨·安德森女士,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 其他发言者:** 莫拉特·乌苏波夫先生,吉尔吉斯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 皮尔·贝内代托·弗勒西斯先生,意大利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 伊巴·迪居尼·卡大使,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
- 卡马勒什·沙尔马大使,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
- 维克多·赛吉瓦利先生,国际公务员,新教牧师,作家
- 恩斯特·祖哈尔里帕大使,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
- 里查德·乔丹先生,可持续发展问题非政府组织,全国艺术俱乐部理事会理事,
- 达沃德·纳比·拉赫内教授,佩斯大学
- 马布德·恩萨里教授,威廉·佩特森大学
- 韦恩·史密斯先生,非政府组织“友谊力量”创始人和主席
- 哈丽雅特·曼德尔女士,犹太社区关系理事会
- 主办者:**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关系学院

行政摘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贾德·侯赛尼安大使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安德森致简短欢迎辞。

内贾德·侯赛尼安大使介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全球方针,认为它是一种新的范式,将通过宽容改善国际环境,从而确定世界的各种基准,在这个世界上,和平与繁荣将有更多机会战胜冲突、仇恨、贫穷与战争,在这个世界上,地球上将有更多的居民有可能享有和平、安全与繁荣的生活。

安德森院长说哥伦比亚大学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实践者,因为其学生来自 75 个不同的国家。她说,如果世界各国领导人能够聚会在一起,探讨对文化、社区、权利、正义、平等、国家和政治权威的不同解释,则尽管会有明显分歧,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将为“建立一个更为成熟、更倾向世界主义、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社会,一个有更多人会感到受到接纳的所在奠定基础”。

第一位小组成员,瓦尔坦·格利戈林博士针对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对伊斯兰教的成见,着重谈了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一观念中的作用。他说:“伊斯兰教始终是一座桥梁、一个文化的交叉点、一个过渡地带、一个通道,而首先是一个庇护地。”格利戈林博士引用阿诺德·汤因比的著作称,亨廷顿因为全然缺乏对穆斯林的历史、文化、神学和人类学知识,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文明没有成为加深理解的桥梁,反而成了导致分离的壁垒,注定引发冲突。

格利戈林博士回顾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尤其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于 1965 年发布称为“*Nostra Aetate*”(我们的时代)的前所未有的可喜宣告之后二者的关系,这一宣告被看作是穆斯林与基督徒对话的转折点。“哈特米总统更进一步,我要说这是一大步。问题不仅仅在于对宗教的了解,而且在于对各种文明和各国人民,对其差异、历史、其独特性及其共性的了解。因此,他倡导在不同文明和这些文明所包容的各国人民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格利戈林博士认为,对话是一种途径,即使不能导致友谊,也能导致在尊重的基础上理解他人。

建议:首先应在穆斯林世界的传统大学与世俗大学之间进行对话。还应在伊朗和所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神学机构与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神学机构之间进行对话。

第二位小组成员,布利特教授从全球角度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据此,联合国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回顾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法案》在西方文明传统中的起源。“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历史时刻,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作为二十世纪中期成果的这两份伟大文件主要是源于西方哲学传统。我们现在为了类似的崇高目标,恰当地转向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个人希望,准备进行的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最终将在未来某一时刻,导致就人类价值观作出正式申明,不是制订一个宪章或契约,罗列一些条条框框来约束其签署者,而是申明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同时深入阐述其在不同文明传统孕育的信仰与理念中的依据。”

布利特教授称这份或这些份文件为世界人类价值观公约,它们完全有可能与《联合国宪章》和各项人权公约中载列的理想与原则相重迭。“但这些文书的权威

主要建立在对欧洲文化传统体现的普遍道义理念的国际认同上,与此不同的是,世界人类价值观公约将显示人类社会在其种种文明差异前提下的道义趋同。它将不是约束性的,但却是一种国际道义和理念标准,一个所有文明中的人民都可以据以找到共同的道德立足点的指南。世界人类价值观公约将是我们走向国际新纪元的适当出发点,在这样一个新纪元中,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差异都将受到称颂,而单一文明的视野主导世界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布利特教授列出了一系列主题,可作为在为制订世界人类价值观公约进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时探讨的议题。他的建议是:

- (1) 宪法与公民身份。
- (2) 法和法律程序。
- (3) 宗教和个人地位。
- (4) 主权与边界。
- (5) 教育和信息传播。
- (6) 经济秩序。
- (7) 社会福利。
- (8) 童年与老年。
- (9) 妇女地位。
- (10) 环境遗产。

布利特教授最后提到了 800 年前伊朗的大诗人法里德丁·阿塔尔在《鸟类会议》中讲的“三十只鸟”的故事,他指出,尽管道路各有不同,但所有文明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他促请人们接受哈特米总统的邀请,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管最后是否能够达成关于人类价值观的国际声明,我们希望实现的相互理解不仅值得我们去追求,而且,它可能也是我们锻造和谐的未来世界的最好机会。

第三位小组成员,阿里·梅兹罗伊教授介绍了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微观分析,他认为文明关乎民众,而民众分为小的群体,不是大片显现在地图上。因此,我们必须留心社会中的社会,甚至是街区中的社会。他认为每一种文明中都存在一些危险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妨碍进行有效对话,还可能导致紧张与冲突(即,技能和收入分配不均,以及社会中存在多个种族群体,相互间有明显敌意)。

梅兹罗伊教授列举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国的一系列例子说明他的这两个观点,突出在地方和个人层面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紧迫性。

第四位发言人,贾瓦德·扎里夫博士报告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就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问题刚刚于德黑兰召开的第一次伊斯兰专题讨论会(1999年5月3日至5日)的成果。讨论会是哈特米总统倡议召开的,他写信给伊斯兰会议组织所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请他们派出高级代表,参与为促成对话而进行一次对话。尽管筹备时间很短,但各方踊跃参加了讨论会。

扎里夫博士强调,讨论会中的思路是,不同文明之间真正进行对话的出发点应当是:“尊重的原则,宽容的原则,承认多种文明可以共存的原则——世界不应只有一种流行的、主导的文明——平等的原则……为进行对话,需要接受这些重要原则”。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问题,扎里夫博士说,不妨指出,布利特教授在他今天的介绍中提出的许多主题,都在德黑兰的专题讨论会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中有所论述。他还说:“我们不应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限于政治领域。本小组的杰出成员提出了社会和全球层面上的大量问题领域,在这些层面上,对话将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领域包括妇女尊严、人权、老年、青年和儿童,乃至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和环境恶化。”

扎里夫博士称,已指定 2001 年,即新的千年的第一个年头,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以显示持续对话的重要性。因此,在伊斯兰专题讨论会的最后文件(A/54/116,附件)的补编中,有一份十年行动纲领。

讨论会随后进行自由发言。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莫拉特·乌苏波夫先生称赞有关倡议的价值和及时性,即阿卡耶夫总统认为应复兴“丝绸之路外交”,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和平与安全。他提请注意吉尔吉斯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两位总统各自的想法是相辅相成的。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皮尔·贝内代托·弗朗西斯先生强调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持续性,认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互动。他回顾了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说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正在涤荡孤立主义的最后一丝残余。他还提到 1998 年 12 月伊朗和意大利就“伊朗和意大利的宗教、社会与国家”这一主题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它与今天的小组讨论会一样,旨在找出各国人民之间的接触点,以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促进合作,而不论存在何种文化和种族差异。弗朗西斯先生强调迫切需要将哈特米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提出的倡议化为一个持续的进程,激励政府和民间社团领导人作出努力。

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伊巴·迪居尼·卡大使提请注意应对媒体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创造的机会和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他表示,如大会第 53/22 号决议所述,应对媒体的作用作进一步研究和阐述,以利用媒体的合力。卡大使强调承认和尊重其他文化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最基本前提。他举例说,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作为基督徒,在塞内加尔这个穆斯林占压倒优势的国家担任总统,任期 20 年。卡大使还回顾,桑戈尔总统曾谈到普世文明,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卡马勒什·沙尔马大使介绍了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微观分析,他赞同梅兹罗伊教授的观点,即文明关乎民众,而民众分成小的群体。沙尔马大使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就对话作了哲学性阐释,他说:“归根结底,必须观照个人的心灵,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友谊力量的创始人和主席韦恩·史密斯先生随后又论述了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观(即,首先必须在个人层面上关注个人的心灵,思想随后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

沙尔马大使谈到了他对关于一神教的说法的不安,这种说法意味着只有犹太教包含在内,似乎排除了其他宗教,而这些宗教也只信奉一个神祉,但其信徒,例如印度教徒,对宗教的展现自有其不同的经验。他提到了对只信奉一个神祉的神秘解释,比喻

说人们由于不能直视太阳,只能注视可以看到太阳的任何地方。沙尔马大使问道:“如果你在成千上万个池塘中看到太阳,你是看到成千上万个太阳,还是只看到同一个太阳?神是一个个不同的实体,抑或是同一个神无穷无尽的化身或表现?”

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斯特·祖哈尔里帕大使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一可喜倡议,有其重要和切实的背景信息和文件作为基础,不必一切从零开始。例如,他举出联合国宽容年,奥地利随后于1997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以文件形式就仇恨的根源问题作出的贡献,几大宗教之间展开的对话,如伊朗和奥地利于1993年和1997年进行的两次对话的成果,以及诉诸良知基金会1998年在维也纳就科索沃问题组织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宗教领袖会议通过的宣言。

在其他一些发言和问答后,主席皮科先生总结说,衡量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观念的成败,要看它能否在社会各个部分、实际上是世界各个地区推动和解进程。“我谨在此建议,在不同文明之间展开对话之际,我们应通力合作,共同反对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唯一敌人。它不是哪一个国家。不是哪一种宗教。不是哪一种文化。这个敌人就是不宽容。历史不会杀人。宗教不摧毁建筑,制度也不会去强奸。只有人才去做这种事情。在我们讲话时,仍有人宣称,他们的仇恨源于历史、或宗教、或文明、或文化。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只有个人,才会产生仇恨,只有个人,才能进行对话。差异不是一种威胁,它是生活的开端。”